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17)02-0064-0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意蕴及其启示

□任 瞢

(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运用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社会制度层面探讨了人类与自然、社会协同发展的规律性,触及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质,提出了以“物质变换”为特征、以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为原则的劳动实践观,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物质财富观,注重自然资源循环利用的经济生态观,倡导节约消费的适度消费观,超越资本逻辑、解决社会各种利益矛盾的社会正义观。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掘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资源,可以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态视域,为推进绿色发展和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启迪。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逻辑;生态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支配劳动以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财富和积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规律。尽管生态问题并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但是,不可否认,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凯歌行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对待自然的敌意,即为了攫取剩余价值而过度开采自然资源,造成原材料短缺、土壤破坏等自然力供给不足等问题,已经进入到马克思的理论视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确有关于如何扬弃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的大篇幅论述,存在着从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层面来探讨生态问题的理论框架,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劳动实践观、物质财富观、经济生态观、适度消费观、资本价值观和社会正义观之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后人留下了关于解决生态问题的丰厚的思想资源和巨大的理论阐释空间,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一、物质变换:劳动实践的生态本质

在马克思那里,实践概念与生产、劳动概念经常被交替使用,由于工业社会的历史背景,“实

践”概念被赋予生产性的历史内涵,特别是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物质变换”来定义生产性实践,揭示人与自然之间依赖、同一、能动与受动关系的辩证法,便意味着他的劳动实践观具有显著的生态学特征。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从哲学层面论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同一关系,提出了“感性活动”即“对象化活动”的理论,强调劳动实践既要按照“美的规律”(人的“内在的尺度”)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又要遵循自然之本质规律(“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实现“自然界的真正复活”^[1],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双向过程就是改造自然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统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用“物质变换”这个极富生态意蕴的概念来定义人类劳动,形象地描述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对象性关系,强调劳动不只是联结人与自然的桥梁,它更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2]207-208}。

物质变换概念首次由德国生理学家希格瓦特(G.C.Sigwart)于1815年提出,特指生命有机体为了维持生存而进行的物质代谢和生命循环。之后,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J.V.Liebig)在《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一书中,将生物学

收稿日期:2016-10-12

作者简介:任瞢(1965-),女,安徽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意义上的物质代谢观扩展到化学领域,描述了自然界中无机物质和有机生命物质之间的物质代谢过程,强调理性农业应该注重土地自身的新陈代谢循环,但资本主义农业耕作制度因为不对土壤改良进行投资,所以必然导致土地的贫瘠^[3]。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称赞李比希“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资本主义农业)的消极方面”^{[12]580},而且还进一步从社会生产关系中揭示物质变换的丰富内涵,强调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离不开具体的物质生产方式。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产的目的以及人们对待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态度和方式,决定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分配,进而也决定着人们在资源环境中的占有和使用上的利益关系。故生态问题反映的是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占有、分配和利用上的利益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根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没有得到主体的有效控制和合理调节,根源于不同主体间利益关系的分化与对抗。由此,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积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受无止境的资本增殖支配的劳动过程必然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出现物质变换裂缝。对于这种物质变换裂缝的严重后果,马克思曾感到忧心忡忡:“需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V—4]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4]481} 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能够保障生产的自然条件安全的公有制,遵循自然规律,自觉调控生产实践,“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12]587},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应该说,马克思从资本批判视域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是独特而深刻的。

在此,马克思提出的以“物质变换”为特征、以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为原则的劳动实践观,凸显了劳动实践的生态本质,启迪我们应该在尊重、顺应自然之本质规律的基础上,创新生态文明的劳动样式,对自然界既要利用和改造,又要保护和建设。通过生态劳动实践来修复、更新和补偿所耗损的生态环境资源,养护和增值自然环境的生态使用价值,建立人与自然之

间的良性物质变换关系。

二、自然的资源价值:财富的生产源泉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视域中,“价值”是一个与商品和商品经济相伴随、关涉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特有范畴。在《资本论》中,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对抗性生产关系,为剩余价值学说奠定基石,马克思当时主要关注的是物化在社会经济系统某个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侧重研究社会经济系统的商品价值,并以“交换价值”为切入点,界定商品价值的本质规定,创立了劳动价值论。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产品的自然存在即自然物质只能构成商品的使用价值,且自然物质的这种有用性是构成商品价值的必要条件。商品要有价值,首先必须有效用。自然物质作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是财富(使用价值)的源泉。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5] 自然物质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和“超额利润”的“自然基础”^{[6]728}。这里,马克思所谈论的自然物质的效用其实就是自然的使用价值。要使“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必须“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12]51}。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对象化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们在创造使用价值时所耗费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抽象的人类一般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具体的有用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体现商品的自然属性或自然存在,价值体现商品特有的社会属性或社会存在,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则是价值在市场供求关系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商品的价值,主要是为了揭露资本家剥削雇佣劳动者、榨取剩余价值的秘密。本来,商品生产是为了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但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销售,进而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满足资本对超额利润的追求。这种基于利润动机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必然导致商品使用价值的生产从属于商品交换价值的生产,即具体劳动从属于抽象劳动。既然资本家关心的





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会在“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中造成“无法弥补的裂缝”^{[6]919},带来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滥用。

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物质在生产中的基础性作用,并从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角度考察了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在财富创造和影响剩余价值率高低方面所起的作用。他认为,自然资源作为一种自然财富(自然的使用价值)会影响劳动生产率,尤其在农业和采掘业等生产行业,“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由于自然条件的生产率不同,同量劳动会体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或使用价值”^{[6]924}。如果自然资源不是作为商品形式的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那么这些自然资源本身就没有价值,既不转移旧价值,也不创造新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资源作为生产要素是以商品形式进入生产过程,自然资源状况会直接影响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发挥,并决定劳动时间的长短,进而间接地决定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也决定着剩余价值率的高低,“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2]586}。也就是说,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会因自然条件的差异而显示出不同,通常,在自然资源匮乏的情况下生产的商品价值较大,因为它们需要人类付出更多的劳动,而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价值较小,因为它们只需要较少的劳动投入和劳动时间,故而会降低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不仅农业劳动如此,而且工业劳动生产率也是首先取决于原料的特性。这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肯定了自然资源作为自然的生产要素对超额利润的获得以及价值增殖所起的作用,强调自然资源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构成要素,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人类劳动投入的多少,特别是良好的自然条件可以节约必要劳动时间,使工人有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去创造剩余价值,进而为资本家尽可能无偿占有和利用自然、获得超额利润提供了可能。

显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强调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资源有无价值,主要取决于它

能否为社会生产提供原料、是否投入了人类劳动。天然生成的自然资源和纯粹的自然力不是劳动的产物,本身没有价值。只有经过人类劳动加工改造过的自然资源才有价值,其价值大小取决于人们对其进行开发利用过程中所投入的劳动量大小。

尽管天然生成的自然资源不含有人类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只是价值形成与价值创造的自然基础,但马克思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象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2]123}。他以土地为例,说明了自然所有权(产权)的出现,可以使本来没有价值的可用资源具有“虚幻的价格形式”。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并不是土地价值的货币表现,“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里面”^{[2]123}。但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所有具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包括实物和非实物形态)都被商品化了,土地可以进行买卖交易。此时,土地的价格是“地租资本化的另一种表现”^{[6]703},“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增殖价值的形式”^{[6]698}。用土地所有权(产权)的垄断来对土地进行定价,就是地租的资本化。这种交易是建立在创造自然物质买卖权利的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以此推论,“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是瀑布,是富饶的矿山,是盛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对一部分土地享有权利而成为这种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会以地租形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种超额利润夺走”^{[6]874}。

根据马克思关于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价格的论述,我们可以获得以下认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没有投入人类劳动的天然的自然资源虽无价值,但却有价格。当自然资源作为商品化的生产要素进入商品交换环节,人们会因为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有用性、垄断性而赋予其“虚幻的价格”。所以,自然资源的价格既可以依据其凝结的人类劳动价值量大小来确定,也可以依据自然资源的“归属”情况和稀缺程度来确定。我们决不能仅以人类投入自然物的劳动量来规定自然物的价格。那样做势必会低估自然资源的价格,形成“资源无价”的错误观念。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的原生自然资源都有了归





属,明晰的产权即自然所有权关系使自然资源有价格,可以交易,成为商品。不仅矿产、天然林、草地等自然产品商品化了,而且水力、风力等纯粹的自然力也在商品化。马克思的自然价格理论启迪我们:要缓解目前我国自然资源的供求矛盾,就需要建立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将资源环境纳入产权关系和目标函数,依据人类投入到资源环境中的劳动量,或者自然资源在现行生产关系及所有权中的稀缺程度以及自然力可能带来的预期收入来制定合理的自然资源价格体系,实施生态补偿。

应该看到,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尚未超过生态阈值,自然资源完全可以凭借自我修复能力和再生能力来保持其储藏量,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人类也无需花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再生产自然生态资源。在此意义上,空气、天然草地、森林等没有价值。但是,今天的人口规模、生产规模和消费规模已大大超过自然承载力,生产规模和消费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带来对自然界的过度采伐和过度排废。人类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付出社会必要劳动来进行生态修复和自然资源的再生产。这是一个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交织交融、互相补偿的过程。以可再生资源森林为例,人们今天不仅要投入劳动保护天然林,而且还要种植人工林。此时,天然林和人工林都具有价值,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生态环境破坏越严重,人类直接或间接投入生态修复和自然再生过程的劳动也就越多,相应地,自然资源内含的价值量也会越高。

尽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影响,触及到自然与价值之间的相关性,间接地肯定了自然的资源价值,但这一理论主要强调抽象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它所直接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劳动的经济关系,并不涉及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多元价值关系。为了揭露资本主义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创立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当时主要关注的是物化在社会经济系统某个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侧重研究商品价值,论证资本主义是私有制社会形态发展的极端形式,它将人类的财富生产方式转化为商品生产方式,将商品变成商品拜物教,使用价值变

成交换价值,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也随之变成工具性的关系,自然的本质完全被实用化了,所以,马克思说:“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私有制使“一切生灵,水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植物,都成了财产”^[7],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有用物”,即服从于人的需要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4]390},仅仅被用来满足资本家的贪欲。与此同时,自然满足人们精神的、情感的、艺术的、审美的等多方面需求则被遮蔽,资本效用原则必然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

今天,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认知能力和科研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的需求层次不断得到提升,而满足这些需求的人类活动方式也越来越丰富,自然物质的新的使用价值会不断被发现,自然的效用和功能也越来越多样化。这决定了我们不能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分析商品价值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自然资源的价值。更何况,马克思当年也希望自然物质能“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8]。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交织相融的统一整体,我们应该结合马克思在哲学上对自然的对象性价值的理解来重新阐释自然资源的价值基础,同时还应该吸收现代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价格的理论。

三、自然力循环利用:生态经济的本质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K.波尔丁(Kenneth Boulding)创立了循环经济理论。20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引入循环经济理念。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实行清洁生产和资源的节约利用、循环利用。马克思虽未使用过“循环经济”这个概念,但是,他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以及废物资源化、“生产排泄物的充分利用”、资源自然力循环利用等思想,实际上已把社会经济过程植入自然生态过程中,内含着循环经济观念的萌芽,反映了马克思本人的经济生态观,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实践价值。

首先,马克思阐述了经济循环的特征。在《资本论》第3卷第六章,马克思从节约不变资本





和提高利润率的角度提出了废物回收再利用的思想。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利润率代表剩余价值和原料价格的比率,利润率的大小和原料价格的上下波动也成反比例变化,“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6]115}。由于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可以得到现实的利益,故资本家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率,必然要想办法减少生产原料的消耗量,进而提高可变资本的比重。结果,“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6]115}。“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6]94}。同样,“进入直接消费的产品,在离开消费本身时重新成为生产的原料,如自然过程中的肥料等等,用废布造纸等等”^{[9]112}。马克思的这些描述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倡导的“资源开发→产品生产→废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闭环循环发展模式。

其次,马克思阐述了节约资源的原则。一是要重视源头控制,提高生产原料利用率,尽可能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流程的资源消耗,“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6]117},实现资源投入最小化。二是要重视生产的过程控制,通过原料的重复利用减少生产和消费过程的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这是一种废料循环再利用的节约,“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工业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转化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转化为药品”^{[6]117}。三是要重视终端控制,通过回收利用废弃物,实现废物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资源化再循环利用。这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变废为宝”,即通过技术开发和应用,将废气、废水、废渣等转化成有用物品。尽管资本家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也会通过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量来节约不变资本,但是,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而是为了提高利润率,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最后,马克思阐述了经济循环与生态循环相互融合的可行性。其一,科技进步、机器的改良和大规模社会劳动是实现资源自然力循环利用

的前提条件。在马克思看来,废弃物的再利用和再循环追求规模效益,“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6]94}。但这一切必须依赖于生产力的提高、科技的进步和机器的改良,况且,追求剩余价值的动机也会不断刺激资本家进行技术创新,“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技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6]115},并教会“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2]699}。其二,制度变革是实现循环经济的最终手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严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废弃物、排泄物的处理不当。他认为,要解决废弃物、排泄物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就需要依靠科技进步,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解决的方法仅仅围绕着有用性,只有当科学发现了它们的效用且可以使资本家得到更多物质利益,或是原料太昂贵时,资本家才会局部地处理它们。所以,生态危机的症结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要“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2]587},就必须通过制度变革,改变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变换形式,让“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928-929}。从今天的意义上来讲,就是要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原则,进行集约化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四、适度消费:人类消费理念的提升

马克思在构建经济学理论大厦时,极为重视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批判了资本主义消费异化,对消费与生产、消费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以及消费的适度性进行系统论述,提出了蕴含着现代绿色消费理念的科学的、合理的消费观。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一是生产与消费相





互媒介,生产创造出消费方式和消费对象即消费品,消费替生产的产品创造出消费主体。马克思说:“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10]9}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二是生产与消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10]10}。生产过程包含着“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10]8}。即个人生命力的消费和生产资料的消费。从主体方面看,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要支出和消耗自己的脑力和体力;从客体方面看,“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烧中)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10]8}。与此同时,“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10]9},消费是社会再生产和经济运行的前提和动力,生产与消费越来越一体化了。

鉴于消费与生产的同一性,马克思主张发展生产力与发展消费力同步,并倡导一种与生产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合理消费,反对过度消费和奢侈浪费。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习以为常的挥霍”成了“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2]685};“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4]525}。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产阶级才有消费自由,资本家挥金如土,而穷人连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也得不到满足。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这种消费异化的根源。

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自由竞争所造成的对自然资源的滥用,马克思强调生产和消费不能超过资源禀赋承载能力,主张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约劳动时间来发展经济。马克思说:“真正的经济一节约一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9]107}。

马克思在主张节约生产、节约消费的同时,还鼓励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在他看来,消费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应该体现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和全面性。人类对物质产品的适度消费意味着应该提高消费主体素质,全面提升人

类消费理念,通过增加对精神文化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来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显然,马克思所倡导的消费具有适度性和协调性的显著特征。其消费观要求人类的消费能力与生产能力相协调、人类的消费能力与资源禀赋承载能力相协调、人类的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相协调,这无疑为我们今天树立绿色消费的理念,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探索社会生产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规律,平衡好生产要素供给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倡导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五、社会正义:环境正义实现的前提

根据唯物史观,“正义”取决于社会的分配制度同生产方式的匹配程度,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具有阶级性、历史性和现实依赖性。正义的实现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矛盾的协调和解决。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提出过环境正义的概念,但是,在马克思为劳动阶级争取自身权利的理论中仍有丰富的关于社会正义的思想,并触及到资本与人们生存环境的公平关系。“环境正义”应该是马克思公平正义观念的延展。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资本的本性就是要“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1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生产剩余价值。受这一绝对规律的支配,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只会把自然资源当作赚钱的“生产资料”来看待,而根本不会考虑生产劳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由于需要导向性的生产从属于利润导向性的生产,“资本”支配“劳动”,致使具体劳动从属于抽象劳动、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从属于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生产。显然,这种生产方式完全颠倒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价值”)的关系。本来,使用价值应是价值的基础,商品之所以能交换,乃是因为它作为劳动产品,能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销售、满足资本对高额利润的追求,故商品的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具有支配作用。更进一步,衡量财富的准则也不是产品所代表的使用价值量,而





是货币所代表的交换价值量,即资本所追求的价值增殖。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内在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贪婪本性使其将人类的财富生产完全转化为商品生产,私人财富的增加是以自然产品等公共财富的损耗、滥用为代价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会造成物质财富上的分配不公,而且也会以环境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利益,造成环境不公,经济不正义必然导致环境不正义。社会正义应是环境正义的制度保障。资本应该为因投资而导致环境遭破坏的生存者付费。只有建立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秩序,才能有效避免由于权力的滥用和分配不公而造成的生态失衡。马克思当年主张通过制度变革来协调各种利益矛盾,实现社会正义,消除人们在生存权利包括生态权益方面的不公正现象,实际上已体现了环境正义的宗旨。

应该说,马克思思想的深刻之处就体现在,他通过揭露自然生态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质,阐明了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实现路径和社会历史形式,强调只有超越资本主义才能建设全球性的生态文明。未来的理想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已得到根本解决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6]928-929}。马克思关于生态问题的社会化解决思路为我们今天探索解决全球性生态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并深刻地启迪人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在占有、分配和使用自然资源上的利益关系,协调好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当今中国应该通过利益分配的公平正义制度安排,摆脱被资本利益引导的生产生活方式,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之路。

六、意义与启示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发掘这份珍贵的思想资源,对于我们从生态文明视域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推进全球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颇具启发意义。

第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隐含着从生

产方式或社会制度层面探讨社会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范式,为我们今天立足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确立经济学新目标,建构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即包括环境经济学、绿色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在内的可持续性经济科学提供了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与进入“新常态”,赋予中国政治经济学新目标、新理念。中国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秉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轴心的经济分析体系,研究经济关系运行的规律性,又要在生态文明视域下探索“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规律,以追求节约劳动、节约土地、节约自然资源,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为目标,从以往研究经济运行的内在性机理(经济规律)转向研究经济运行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社会经济规律与自然生态的发展规律之间的复杂性关系,研究劳动、资本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环境资源价值的构成、熵定律对于经济系统的意义等,找到一种健康、持续、绿色发展的新的经济学的叙事方式,拓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丰富和发展其财富理论、资本理论、价值理论、经济规律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生活方式论等,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绿色化创新。

第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运用阶级分析法,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逐利本性必然带来的生产与消费的扩张性,以及可能造成的对资源和环境自然力的过度消耗,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所遵循的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本质,为我们今天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效驾驭资本、正确引导资本为生态文明建设服务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市场全球化的世界性潮流和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肆意掠夺和盘剥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将污染性经济与产业结构转移至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环境利己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由此所造成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实质上依然没有逃脱资本的逻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神上来,有助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正确认识资本的两面性,依



靠制度建设,创新21世纪中国资本运行的生态模式,在实践中既要遏制资本扩张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又要超越资本逻辑,积极探索资本创新参与生态建设的可能路径,构建合理的资本伦理约束和法律约束系统,促进资本与劳动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进而有效发挥资本运作在改善生态环境、投资生态产业和生产生态产品等方面的支撑和保障作用,科学地运用资本造福人民,让生态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7;122.
- [2]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3] 尤·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M].刘更另,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6.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8.
- [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95.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3.
-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9.

(责任编辑 童 萍)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Karl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Its Enlightenment

REN Kai

Abstract In *Das Kapital* and his manuscripts, Karl Marx's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by apply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scusses the regularity of the synergetic development among the human, the nature and the society from the aspect of social institution, reveals the anti-ecological essence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puts forwards the view of labor practi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interchange with Nature" and with the principle of the unity of purposiveness and regularity, the view of material wealth based o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the view of economic ecology laying emphasis on the recycl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view of moderate consumption advocating the economy in consumption, and the view of social justice surpassing the capital logic and solving various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society. The discovery of classic Marxist thought resources of ecology from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n expand the ecological horizon of the research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provide a beneficial enlightenment for promoting the green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Karl Marx;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pital logic; ecology or ecosystem